

亲子关系对流动家庭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 CEPS 基线数据的实证调查

陆温婷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人口流动出现了家庭化迁移的新模式,因此流动家庭儿童的健康成长日益得到关注。基于中国家庭教育追踪调查(CEPS)依次考察了亲子关系、非认知能力在流动和非流动群体中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通过建立三组嵌套模型深入分析亲子关系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 流动家庭与非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存在明显差别,流动家庭中亲子陪伴活动的频率更高,但非流动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更频繁,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更亲密;2. 流动家庭学生与非流动家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存在区别,流动家庭学生集体融入能力高于非流动家庭,但是自身情绪调控能力、自我效能感更低;3. 亲子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非认知能力因流动迁移产生的差异。因此,应重视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关键词:流动家庭儿童;亲子关系;非认知能力;CEPS

中图分类号:G913.5;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4-0097-12

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显示,中国人口流动规模进一步增长至37582万人,相比2010年增长9.5个百分点,“乡—城”流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规模达2.49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6.26%^[1]。这说明中国人口流动的方向仍以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为主,而且农村人口依然是人口流动大军中的主力^[2-3]。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往往工作层次较低,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降低他们的城市融入感。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人口

流动较之以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是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4],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呈家庭化迁移的趋势逐渐显现^[5],流动群体举家迁移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父母会倾向于携带子女一同外出务工。据此,在上述前人关于流动人口研究结论的前置背景下,一个新的研究问题也随之出现:人口流动除了对流动家庭的父母产生影响之外,会不会对他们的子女,即因父母外出打工所导致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产生代际的传递影响?

近些年来,非认知能力与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关系备受学术界和政策理论界的关注。所谓

收稿日期:2022-05-09

作者简介:陆温婷(1999—),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社会保障。

非认知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人情商和抗逆力的体现。非认知能力被证明是个体发展与成功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父母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于其未来的发展更加重要,例如一些与认知无关的好奇心、敢于打破常规等非认知特征更有助于儿童的成功^[6-7]。基于此,本文尝试将跟随家庭迁移流动这一因素与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进行联系,探究流动状态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和效应。现有文献已经对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如认为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稳定性不如同龄儿童,并认为这主要是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所导致的,即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影响^[8-9]。在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少部分学者发现流动家庭儿童较之同龄城市非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相对落后^[10],但对于两类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少有提及,更不用说其中的作用机制。因此,笔者整合了上述研究结论和研究盲点,借鉴留守儿童研究中关于亲子关系和非认知能力关系的部分,将本研究的重心聚焦于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与非流动儿童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流动家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如何;第二,流动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如何,这又是如何影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 非认知能力的概念回溯

非认知能力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Bowles 和 Gintis 提出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能力具体可以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10]。程飞认为,个人的经济产出与他的非认知能力之间具有

很强的相关性,对非认知能力的早期干预可以有效帮助个人在未来获得劳动力市场中的成功^[11]。Heckman 等人认为,非认知能力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构成要素,它既可以直接通过生产率效应增加劳动收入,也可以间接通过影响个人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偏好以及技能形成,以提高教育回报率与经验回报率增加工资收入^[12]。

(二) 不同流动状态之于家庭亲子关系的差异

参照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与家庭亲子关系的研究结论,对流动家庭中亲子关系质量的考量也是有必要的。美国心理治疗专家默里·波文提出了著名的家庭系统理论,他将家庭视作一个完整的单位、看作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3]。家庭作为重要的初级群体之一,对家庭成员的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家庭是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场所,未成年子女通过对父母行为的学习、模仿,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其次,从家庭资本的角度来看,父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子女所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当研究者对某位家庭成员单独了解时,如果研究目光脱离了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就不可能对该研究个体有充分的了解。他强调在家庭系统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情绪等的互相作用以及对彼此造成的影响,认为个体的心理发展会受到其所在的家庭系统的影响。

将上述研究视角转换到流动家庭,流动人口往往是因经济因素进行迁移,目的是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因此,相较城市本地家庭,他们往往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同时,因流动家庭的父母将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以养家糊口,他们对子女的关注度较之城市家庭没有那么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亲子之间沟通不畅、互动不频繁、家庭亲密关系不强。据此,提出假设 1:非流动

家庭的亲子关系要比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更融洽。

(三) 不同流动状态之于非认知能力的差异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以及成长环境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有明显的影响^[14]。家庭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尤其是对他们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父母的陪伴以及亲子间的有效互动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我控制能力,并且规范他们的社会行为。但是,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亲子关系的疏离可能使他们无法享受完整的家庭亲子生活,这将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不利于他们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据此,提出假设2:流动家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要低于非流动儿童;假设3:亲子关系越融洽,流动家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二、数据及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选用的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2014年的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的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2万名学生。之所以选择CEPS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因为CEPS是我国最早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且针对初中教育阶段儿童进行大规模追踪的调研项目。此外,CEPS也是目前公开微观数据库中唯一能够完整囊括两个初中教育阶段(7年级和9年级)青少年群体教育、家庭和学校

信息的最新数据集。为集中探讨亲子关系对流动家庭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笔者根据儿童的迁移流动状态,剔除本地非流动儿童样本,保留省内流动、跨省流动状态样本后得到流动儿童样本3379份用以研究。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黄超在家长教育方式的阶层差异对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交往能力、集体融入这三个变量更加容易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15]。参照已有学者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本研究选取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自身情绪调控能力以及集体融入能力这三个变量来测量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三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1) 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指学生对于自身能力的判断和信心。本研究对自我效能感的关注类别主要包括学生完成学业的能力、表达能力、反应能力以及求知欲望。首先,学业完成能力在CEPS问卷中的参考题目为“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其次,表达能力的参考题为“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再次,反应能力的参考题目为“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最后,衡量求知欲望的参考题目是“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以上四部分的问题都是以四分量表的形式呈现,包括赋值为1—4的“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四种选项。笔者将学生勾选的选项所对应的值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6—24的自我效能感连续性变量,取值越高表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2) 自身情绪调控能力。自我情绪调控能力指儿童在复杂的情境下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情绪控制力,CEPS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在过去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抑郁、不快

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原问题的选项包括赋值为1—5的“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为了便于统计,重新将选项按照得分越高代表情绪调控能力越好进行排序加总,得出取值范围为5—25的自身情绪调控能力连续变量,取值越大代表自身的情绪调控能力越好。

(3)集体融入能力。集体融入能力维度体现的是儿童与同学、老师等异质性同伴交流、互动与合作的情况,通过三道题目“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进行衡量,问题回答的选项包括赋值为1—4的“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将三题回答进行加总,得到取值范围为3—12的连续变量,取值越大代表学生的集体融入能力越强。

2. 关键解释变量。本研究主要探讨亲子关系对流动家庭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所以关键解释变量包括两种:亲子关系、是否是流动家庭儿童。基本理论预设为:在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进行有效的亲子互动和交流,从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16]。因此,本研究将亲子关系操作化为三个变量,包括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频率、父母陪伴子女进行活动的频率、父母和子女的亲密程度。其中,父母和子女的亲密程度以及前置因素迁移流动状态为定类变量,其他为连续变量。

(1)迁移流动状态。根据研究需要,把基线数据中学生迁移流动状态的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合并为流动子女,“流动子女”“非流动子女”分别赋值1和0,共得到15987名本地非流动子女、3379名流动子女的有效样本。

(2)亲子关系。首先,亲子沟通频率用“你的爸爸/妈妈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

的心情、你的心事或烦恼”五个方面来衡量,将五个问题的回答“从不”“偶尔”“经常”从1—3赋值,将所对应的值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5—15的连续变量,值越大说明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频率越高。

其次,陪伴活动的频率。CEPS问卷向学生询问了“你和父母一起做以下事情的频率——吃晚饭,读书,看电视,做运动,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问题的选项包括赋值为1—6的“从未做过”“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将6个方面的回答所对应的值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6—36的连续性变量,取值越大表明父母陪伴子女一起活动的频率越高。

最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程度。从父母亲与子女的关系这一层面进行考量,向学生询问“你和妈妈/爸爸的关系怎么样”。问题回答选项包括“不亲近”“一般”“很亲近”。将回答“很亲近”重新定义为亲近,赋值为1;将“不亲近”和“一般”合并定义为不亲近,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研究者主要选取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等特征性变量组成控制变量丛。

(1)学生个体层面。主要包括年级(九年级=1,七年级=0)、性别(男=1,女=0)、户口类型(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是否为独生子女(是=1,不是=0)、认知能力^①、健康水平(不好=1,一般=2,良好=3)等变量。

(2)家庭特征。家庭特征主要通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等维度进行呈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进行定义,根据各个受教育阶段所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对变量进行重新赋值,数值越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①学生认知能力通过CEPS的认知能力测试题目来测量,CEPS通过语言、图像、计算和逻辑三个维度,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能力的高低通过学生认知能力测试原始总分体现,分值越大认知能力越强。

越高。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具体赋值为“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中专/技校=9”“职业高中/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家庭经济水平的赋值为“困难=1”“中等=2”“富裕=3”。

(3) 学校特征。学校特征主要通过就读学校性质和就读学校在当地所有同类型学校中的排名呈现。其中，就读学校性质为类别变量，学校排名为定序变量。学校性质赋值标准为“公立学校=1”“民办学校=0”，学校排名赋值标准为“中等及以下=1”“中上=2”“最好=3”。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表1为类别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除性别以外，其余类别变量与流动状态的关系显著，表现为流动家庭儿童主要是来自农业家庭，这些流动儿童以低年级的独生子女为主。流动家庭儿

童大多就读排名相对靠后的民办学校，但他们的健康水平与家庭经济状况要优于非流动家庭的孩子。表2是对连续变量的描述性分析，通过对变量均值、标准差的计算，发现流动家庭儿童的认知能力得分明显高于非流动家庭的儿童，集体融入能力也略高于非流动儿童，但非认知能力中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控能力却不如非流动家庭儿童。亲子关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初步来看，流动家庭儿童在陪伴活动方面得分略高，但他们与父母的沟通频率和亲密程度明显不如非流动家庭儿童。另外，流动家庭和非流动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非流动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合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流动家庭与非流动家庭在某些指标上存在差异，后续回归分析中将进一步检验这些差异。

表1 类别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类别变量名称	流动样本		非流动样本		p 值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年级	七年级	2041	60.40	8158	51.03	0.000
	九年级	1338	39.60	7829	48.97	
性别	男	1779	52.65	8186	51.20	0.127
	女	1600	47.35	7801	48.80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2157	63.84	8460	52.92	0.000
	非农户口	1222	36.16	7527	47.08	
是否独生	是	1163	34.42	7257	45.39	0.000
	否	2216	65.58	8730	54.61	
健康水平	不好	140	4.17	691	4.36	0.001
	一般	695	20.72	3752	23.67	
	良好	2519	75.10	11411	71.98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	574	17.05	3487	21.87	0.000
	中等	2585	76.77	11514	72.20	
	富裕	208	6.18	946	5.93	
学校性质	公立学校	2972	87.96	14961	93.58	0.000
	民办学校	407	12.04	1026	6.42	
学校排名	中等及以下	1074	31.78	2609	16.32	0.000
	中上	1732	51.26	9582	59.94	
	好	573	16.96	3796	23.74	
亲子亲密程度	亲近	2399	71.44	12175	76.83	0.000
	不亲近	959	28.56	3672	23.17	

表2 连续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连续变量名称	总样本		流动样本		非流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父母受教育年限	10.66	3.090	10.37	2.910	10.72	3.120
认知水平	9.94	3.760	10.07	3.650	9.92	3.780
亲子沟通频率	20.23	5.090	20.00	5.220	20.29	5.060
陪伴活动频率	21.74	6.700	22.38	6.450	21.60	6.740
自我效能感	19.52	3.240	19.35	3.280	19.56	3.220
自我情绪调控能力	19.57	4.110	19.53	4.200	19.58	4.080
集体融入能力	8.94	2.190	9.00	2.190	8.93	2.190

三、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差异

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刻画流动家庭和非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在不同维度的差异,详见表3。模型1和2表示亲子沟通频率的差异,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通过控制个体特征(年级、性别、户口类型、是否独生子女、认知能力)、家庭特征(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学校特征(学校性质、学校排名)得到流动状态对亲子沟通频率净效应系数的差异值。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前,流动家庭的亲子沟通频率比非流动家庭低29.3%,但是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这种效应减弱到16.6%,而且变得不显著了。这说明亲子沟通频率是受个体特征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模型3和4考察了陪伴活动频率的差异,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加入控制变量前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后,效应差

异一直为正且具有显著性,并从77.8%升至102.5%。这说明,在流动家庭中,父母陪伴儿童一起活动的时间更长,这与表1中得出的初步结论一致,并且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陪伴的频率。模型5和6主要是讨论在不同流动状态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亲密程度。可以发现,模型5和6效应系数的差异值显著且为负,并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这种负向效应也得到了增强。很明显,相比于非流动家庭而言,流动家庭的儿童虽然也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关系显得更加疏离。这可能是因为外出务工的父母虽然将子女带在身边,但是他们之间的情感资源被流动事件削弱了。

这六个模型对假设1作出了回应,发现流动家庭和非流动家庭在亲子关系方面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两种家庭形态在亲子关系的内部维度各有优势。在流动家庭中,父母亲陪伴子女活动的频率更高,但是亲子沟通频率更低,亲子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更加疏离。

表3 不同流动状态下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及亲子亲密程度的差异

变量名称	亲子沟通频率		陪伴活动频率		亲子亲密程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亲子关系效应系数差异	-0.293***	-0.166	0.778***	1.025***	-0.282***	-0.315***
年级		-0.475***		-1.362***		-0.344***
性别		-0.787***		-0.255***		-0.213***
户口类型		0.303***		-0.378***		0.160***
是否独生子女		0.617***		1.445***		0.073*
认知能力		0.082***		0.144***		0.012***

续表

变量名称	亲子沟通频率		陪伴活动频率		亲子亲密程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健康水平(参照组:不好)						
一般		0.565***		0.531**		0.263***
良好		1.753***		2.051***		0.900***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78***		0.331***		0.031***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困难)						
中等		0.359***		1.677***		0.128***
富裕		0.520***		2.814***		0.242***
学校性质		-0.239		2.129***		-0.043
学校排名(参照组:中等及以下)						
中上		0.726***		0.017		0.202***
好		1.393***		1.210***		0.405***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下同。

四、亲子关系对流动家庭 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分别以非认知能力的不同维度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亲子关系是如何影响流动家庭儿童非认知能力的。通过逐一建立嵌套模型,分析亲子关系(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及亲子亲密程度)对非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自我情绪调控能力、集体融入能力)的影响。

(一)亲子关系与自我效能感

构造5个模型来研究亲子关系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详见表4。模型1为基准模型,是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的基础上,直接比较流动和非流动家庭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差异。可以发现,流动家庭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要比非流动家庭儿童低24.8%,这种差异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对其他变量的分析显示,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相对较高,女生的自我效能感比男生高,农村户口的学生自我效能感相对较高;认知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自我效能感也会提高8.6%。健康水平达到良好层次,自我效能感也会更高。研究还发现,当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学校所处的排名

越靠前时,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亲子沟通频率维度,结果显示,亲子沟通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儿童的自我效能感会提升9.5%。相比模型1来说,流动家庭儿童与非流动家庭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差异由24.8%变为22.3%,并且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加入亲子沟通频率这一控制变量后,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之间的自我效能感差距缩小了。也就是说,两类儿童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流动家庭缺乏足够的亲子沟通,这也与表1反映的流动家庭儿童亲子沟通频率的均值比非流动家庭儿童低约0.3个单位一致。

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陪伴活动频率维度,结果显示,父母的陪伴活动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增加6.1%。但是,加入陪伴活动频率维度后,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并没有缩小,而是从24.8%拉伸至30.7%。这说明,父母陪伴活动的增加并不能缩小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差距,陪伴活动不是自我效能感差异的原因。

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亲子关系亲密程度维度,结果显示,与父母很亲近的儿童比那

些不怎么亲近父母的孩子的自我效能感高出 77.6%，这一差距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流动家庭儿童与非流动家庭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差异也被进一步缩小至 20.6%，这说明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两类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差异。如果父母能够增强与孩子的情感联系，流动家庭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有望提高一定的水准。

模型 5 是将亲子关系的所有维度(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全部纳入模型。可以发现,当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

率和亲子亲密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自我效能感会分别增加 6.8%、2.7% 和 40.0%，这说明亲子沟通的三个维度都对自我效能感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是模型 5 中自我效能感的差异为 23.4%，介于模型 1 和模型 3 之间,可能是因为亲子沟通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的增加确实缩小了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之间的自我效能感差距,但是陪伴活动却对这种缩小作用进行了反向拉伸,使得流动状态下的儿童自我效能感较之前两种变量的影响居中间水平。

表 4 不同流动状态儿童的亲子关系对自我效能感影响的差异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自我效能感差异	-0.248***	-0.223***	-0.307***	-0.206***	-0.234***
年级	-0.572***	-0.542***	-0.490***	-0.524***	-0.489***
性别	-0.459***	-0.341***	-0.444***	-0.427***	-0.341***
户口类型	0.235***	0.216***	0.247***	0.202***	0.204***
是否独生子女	0.080	0.034	-0.004	0.076	0.008
认知能力	0.086***	0.068***	0.077***	0.084***	0.067***
健康水平(参照组:不好)					
一般	0.002	-0.033	-0.053	-0.045	-0.061
良好	0.901***	0.754***	0.750***	0.760***	0.656***
父母受教育年限	0.011	-0.012	-0.101	0.003	-0.018*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困难)					
中等	-0.058	-0.085	-0.161***	-0.068	-0.134**
富裕	-0.067	-0.113	-0.245**	-0.083	-0.220*
学校性质	-0.004	0.065	-0.142*	0.003	0.006
学校排名(参照组:中等及以下)					
中上	0.275***	0.191***	0.248***	0.244***	0.171***
好	0.472***	0.325***	0.370***	0.410***	0.274***
关键解释变量					
亲子沟通频率		0.095***			0.068***
陪伴活动频率			0.061***		0.027***
亲子亲密程度				0.776***	0.400***

(二) 亲子关系与自身情绪调控能力

构造五个模型来逐步讨论亲子关系的三个维度对自身情绪调控能力的影响,详见表 5。模型 1 为将个人、家庭和学校特征等变量进行控制后,直接研究流动状态对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影响的基准模型。可以发现,流动家庭儿童在自身情绪调控能力方面的表现明显不如非流动家庭儿

童,两者差异为 20.4%。同时,研究也有一些其他发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低年级、农业户口、为独生子女的流动女童的自我情绪调控能力更加优秀。随着认知水平、健康水平的提升,流动家庭儿童的自我情绪调控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家庭层面,父母受教育年限与儿童情绪调控能力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家庭经济状况对儿

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的影响呈现出随着家庭经济水平升高,自我情绪调控能力先升后降的过程。最后,在公办、排名靠前学校上学的流动家庭儿童,其自身情绪调控能力明显更好。

模型2加入了亲子关系变量中的亲子沟通频率维度,发现亲子沟通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儿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会显著提高12.1%。并且在加入亲子沟通频率维度后,两类儿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的差异也从20.4%缩小至16.9%,说明在纳入亲子沟通频率这一维度后,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之间的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差距在缩小。流动家庭儿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低的原因可能是父母与他们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

模型3加入了亲子陪伴活动维度,发现儿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随着亲子陪伴活动每增加一个单位而提高10.3%,这种正向影响也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两类儿童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的差异反而扩大至30.8%,这说明亲子陪伴活动的增加并不能弥补流动家庭子

女自身情绪调控能力不如意的缺憾。

模型4加入了亲子亲密程度维度,发现当父母与子女之间表现得十分亲密时,对儿童自身情绪调控能力有较大的益处,他们在自身情绪调控能力方面表现出的数值是那些缺乏亲密感孩子的1.75倍。加入这一维度后,两类儿童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的差异也缩小至11.4%,并且这种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亲子亲密程度完全能够解释不同流动状态儿童在自身情绪调控能力方面的差异。

模型5将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及亲子亲密程度这三个维度全部纳入模型,依然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表现为当亲子关系的这三个维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儿童的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分别增加4.8%、7.0%和130.8%。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的差异也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差异缩小至低于基准模型的水平。这说明,亲子沟通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能够完全解释两类儿童关于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的差异。

表5 不同流动状态儿童的亲子关系对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影响的差异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情绪调控能力差异	-0.204***	-0.169**	-0.308***	-0.114	-0.179**
年级	-0.644***	-0.593***	-0.522***	-0.543***	-0.462***
性别	0.129**	0.212***	0.155***	0.189***	0.218***
户口类型	0.315***	0.295***	0.368***	0.256***	0.326***
是否独生子女	0.167**	0.097	0.024	0.143**	0.033
认知能力	0.063***	0.056***	0.049***	0.061***	0.052***
健康水平(参照组:不好)					
一般	1.668***	1.504***	1.652***	1.555***	1.467***
良好	3.681***	3.385***	3.506***	3.353***	3.168***
父母受教育年限	0.006	-0.020	-0.032***	-0.005	-0.039***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困难)					
中等	0.511***	0.453***	0.354***	0.466***	0.351***
富裕	0.482***	0.403***	0.207	0.399***	0.237
学校性质	0.275**	0.230**	-0.001	0.288**	0.013
学校排名(参照组:中等及以下)					
中上	-0.030	-0.115	-0.036	-0.098	-0.123
好	0.177*	-0.027	0.070	0.044	-0.080

续 表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关键解释变量					
亲子沟通频率		0.121***			0.048***
陪伴活动频率			0.103***		0.070***
亲子亲密程度				1.752***	1.308***

(三) 亲子关系与集体融入能力

构造五个模型来研究不同流动状态下集体融入能力的差异,详见表6。模型1依然是基准模型,与非认知能力的前述两个维度不同,流动家庭儿童的集体融入能力不再低于非流动家庭儿童,而是高出10.6%,并且 $p < 0.01$ 。认知能力、健康水平较高的女童,她们的集体融入能力更强。集体融入能力还与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密切相关,父母受教育年限更长、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儿童,在排名更好的公办学校上学时,他们的集体融入能力也会更好。

模型2加入亲子沟通频率维度,发现亲子沟通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的集体融入能力也会显著增加10.8%。但是,加入亲子沟通频率维度后,两类儿童集体融入能力的差异从10.6%拉大至15.6%,这说明亲子沟通频率维度的纳入反而强化了两类儿童在集体融入能力方面的差距,所以亲子沟通频率并不能解释这部分的差异。

模型3纳入陪伴活动频率维度后,发现亲子

陪伴活动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集体融入能力会提高7.5%。但是,加入陪伴活动频率维度后,两类儿童集体融入能力的差异直接缩小至3.0%,并且显著性也消失了,这说明亲子陪伴活动能够完全解释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在集体融入能力方面的差距。

模型4在纳入亲子亲密程度维度后,身处亲密家庭的孩子,他们的集体融入能力比那些亲子关系不亲密的孩子高出88.7%。与模型2相似,集体融入能力的差异也进一步扩大至15.8%,亲子亲密程度维度进一步加剧了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在集体融入能力方面的流动差异。

模型5把亲子关系的所有维度全部纳入模型,发现集体融入能力同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仍具有很强的正相关。结合模型2—4的结果,说明亲子陪伴活动能够完全解释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在集体融入能力方面的差异,而亲子沟通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会加剧这种差异。

表6 亲子关系与集体融入能力的流动差异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集体融入能力差异	0.106***	0.156***	0.030	0.158***	0.125***
年级	0.036	0.081**	0.143***	0.087***	0.151***
性别	-0.358***	-0.256***	-0.336***	-0.324***	-0.251***
户口类型	0.025	-0.016	0.050	-0.007	-0.003
是否独生子女	0.163***	0.083**	0.058	0.153***	0.041
认知能力	0.076***	0.062***	0.064***	0.074***	0.056***
健康水平(参照组:不好)					
一般	0.046	0.031	0.011	-0.017	0.000
良好	0.869***	0.722***	0.724***	0.701***	0.614***
父母受教育年限	0.047***	0.024***	0.020***	0.041***	0.013**

续 表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困难)					
中等	0.302***	0.248***	0.170***	0.277***	0.182***
富裕	0.545***	0.493***	0.343***	0.507***	0.387***
学校性质	0.162***	0.205***	-0.008	0.174***	0.102
学校排名(参照组:中等及以下)					
中上	0.080*	-0.028	0.074*	0.046	-0.025
好	0.339***	0.176***	0.251***	0.274***	0.150***
关键解释变量					
亲子沟通频率		0.108***			0.074***
陪伴活动频率			0.075***		0.041***
亲子亲密程度				0.887***	0.426***

结合前述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在非认知能力方面,流动家庭儿童和非流动家庭儿童是有明显差别的,但并不是一边倒的状态。流动家庭儿童虽然在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情绪调控能力方面弱于非流动家庭儿童,但是他们显然有更强的集体融入能力,这与假设2的猜想不一致。第二,阐明亲子关系对非认知能力的解释能力。总体来看,亲子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但是对非认知能力不同维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来说,亲子沟通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能够部分解释两类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同时,因为不同流动状态下儿童的自我情绪调控能力存在差异,亲子陪伴活动能够完全解释两类儿童集体融入能力的差异。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疏离、亲子之间沟通不畅,使得流动家庭儿童情绪调控能力差、自我效能感低,但是又因为亲子陪伴活动的频率较高,所以流动家庭儿童拥有很好的集体融入能力,假设3得到了验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家庭亲子关系与流动家庭儿童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家庭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儿童的未来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家庭迁移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本研究以中国家庭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的

基线数据为基础,借鉴新人力资本理论,重点关注流动家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研究依次考察了亲子关系、非认知能力在流动和非流动家庭中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通过建立三组嵌套模型深入分析亲子关系(亲子沟通频率、陪伴活动频率和亲子亲密程度)对非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自我情绪调控能力和集体融入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一是流动家庭与非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存在明显差别。流动家庭中的亲子陪伴活动频率更高,但非流动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更频繁,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更亲密。二是流动家庭儿童与非流动家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存在区别,流动家庭儿童集体融入能力高于非流动家庭儿童,但是自身情绪调控能力、自我效能感更低。三是亲子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类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差异。由于亲子关系疏离、亲子之间沟通不畅,流动家庭儿童情绪调控能力差,自我效能感低,但是又因为流动家庭的亲子陪伴相对较为充足,所以流动家庭儿童拥有很好的集体融入能力。

基于研究发现,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目前,教育体系对学生能力的评估仍然主要采用标准化的测试成绩,侧重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于是,家庭的教育投资也大多集中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例如,很多家长希望通过将孩子送往课外补习班

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流动家庭的经济负担。事实上,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诸如探索精神、开放态度,以及合作和自我管理等非认知能力能够影响孩子工作后的经济收入。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评估,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是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流动家庭儿童而言,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他们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首要支撑。然而,部分父母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责任,父母的主要职责是给予子女物质上的教育投入。事实上,工作忙导致的亲子陪伴和交流的机会减少,对子女各方面的成长均存在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鼓励流动家庭的父母与孩子多进行情感沟通,了解其内心的需求,切实做好子女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此外,学校应该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部门,对流动家庭儿童给予充分的关注,及时发现和疏解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促进其认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最后,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一方面长期的二元户籍制度直接导致了流动家庭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教育资源的非公平性影响了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流动家庭的父母往往因生计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参与,这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形成。通过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和福利保障,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使他们的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子女成长,改善亲子关系。

参考文献:

- [1]王桂新.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新动向的考察——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的初步解读[J]. 人口与经济, 2021(5): 36-55.
- [2]周皓. 中国人口流动模式的稳定性及启示——基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3): 28-41.

- [3]刘艺, 郭馨冉, 高传胜.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31-37.
- [4]段成荣, 杨舸, 张斐, 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 人口研究, 2008(6): 30-43.
- [5]吴帆.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03-110.
- [6]王春超, 张承莎. 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性收入[J]. 世界经济, 2019(3): 143-167.
- [7]黄国英, 谢宇.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2): 56-64.
- [8]崔颖, 徐卓君.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机制[J]. 浙江学刊, 2021(5): 125-136.
- [9]王春超, 林俊杰. 父母陪伴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J]. 教育研究, 2021(1): 104-128.
- [10]BOWLES S, GINTIS H.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 Lif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11]程飞. 非认知能力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述评[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9): 33-38.
- [12]JAMES J H, JORA S, SERGIO U.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3): 411-482.
- [13]张志学. 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J]. 心理学探新, 1990(1): 31-34.
- [14]罗芳, 关江华. 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分析[J]. 当代教育科学, 2017(9): 91-96.
- [15]黄超. 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 社会, 2018(6): 216-240.
- [16]于爱华, 王琳, 刘华. 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家校教育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6): 122-141.

(责任编辑:马速)